

高教动态

中央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2014年第20期（总第230期）

目 录

- 一、人大启动综合改革工作 北大方案正征求内部意见
- 二、厦门大学繁荣计划推进人文社科研究
- 三、上海大学改革名额分配办法 博士招生不吃“大锅饭”
- 四、中外合作大学正向“体制内”高校传递压力
- 五、米格尔·帕迪拉：美国公立大学教师工作满意度提升策略
- 六、牛津大学：成立首个金融大数据实验室

一、人大启动综合改革工作 北大方案正征求内部意见

继清华大学综合改革方案获批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征求内部意见之后，中国人民大学的综合改革工作也已经启动。

人大已召开三次改革工作专题讨论会

据人民大学发展规划处消息，今年10月21日、23日、27日，人大召开了三次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专题讨论会，分别讨论了本科教学综合改革及本科生选拔机制改革、研究生培养改革及学生事务综合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人才工作改革及科研体制改革等内容。

9月19日，人民大学启动综合改革动员会，人大常务副校长王利明表示，北大、清华等院校已经向教育部提交了综合改革的方案，人民大学也急需通过综合改革找到发展的突破口，方案的制订应该既结合实际又能体现人大特色，此外综合改革还必须充分调动广大师生参与的积极性。

人大发展规划处副处长赵玉麟表示，人大的综合改革将由学校办公室、发展规划处牵头负责，与研究生院、教务处、人事处、科研处共同完成校部机关版学校综合改革方案工作，教育学院负责教师版的综合改革方案起草工作，由校团委负责学生一揽子改革建议和意见的征集。

北大综改方案正在征求内部意见

《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制定工作于今年1月启动，目前已形成征求意见稿，现正处在第二阶段的全校征求意见中。北大新闻发言人蒋朗朗并未透露《方案》涉及的具体内容，他表示《方案》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还要再做修改，公布并实施的时间要视主管部门批准时间而定。

今年4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周年庆典上，北大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在演讲中表示，北大正在拟定一个综合改革全面深化的方案，而今年距离北大建校120年还有4年，学校计划在这4年通过改革创新推进学校建设，特别在学校的治理、制度和管理这些根本问题上进行提升，“能不能用4年时间，给120年画一个句号。”

8月5日至20日，北大综合改革方案向院士、资深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党委委员、校纪委委员、党代表、教代表、民主党派和党外代表人士以及学校中层干部进行了第一阶段的征求意见。10月底，北大各学院、行政部门纷纷开展“深化综合改革、聚力科学发展”的讨论活动，在学校内部就《方案》征求意见，目前征求意见阶段仍在继续。

清华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开始实施

清华大学“综改方案”早在2012年就开始酝酿，今年10月31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同意《清华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备案的

函，标志着清华“综改方案”正式经国家批准，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清华综合改革方案共五十条，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探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模式。任务包括7个方面：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深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学科发展机制和科技创新体系；改革社会服务体制机制；推进资源管理模式改革；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改革。

综改方案中的人事制度改革早已在生命学院等院系启动，正在全校范围深入推进。在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方面，清华近日刚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将开设2年期通识课程，减少必修专业课数量，提高学生转专业自由度，争取国家支持试点自主设置本科专业，改革本科招生机制等。其他各项改革也将陆续推进。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4年11月04日

二、厦门大学繁荣计划推进人文社科研究

今年9月12日，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首次将季度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发布会开到了德国，在欧洲发出厦大声音；近日，2014年度国家“2011协同创新中心”认定结果公布，厦大牵头的两个中心入选；明年年初，占地2200平方米的公共政策实验室将在厦大公共事务学院投入使用……一个又一个新动向、新事物，让人们一次又一次关注厦大的人文社科研究。

这些变化，来自一个计划。2012年12月15日，厦门大学召开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会，发布《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1)》(以下简称“繁荣计划”)。根据该计划，从那时起，厦大将在原来基础上，每年新增1亿元经费用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力争到2021年建校百年时，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厦大学派”。

从单兵作战到联合攻关

在上述跻身国家队的两个“协同创新中心”中，一个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该中心由厦大牵头，与复旦大学等共同建设，集合了海内外从事台湾研究的代表性学术机构、知名学者和实务部门的专家。中心执行主任、厦大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说：“我们着力把这个中心打造成海内外最具权威性的台湾研究思想库、人才库和信息库。”

在厦大社科处处长陈武元看来，“联合攻关”正成为厦大人文社科研究的大趋势。他介绍，繁荣计划推出后，学校大力抓大平台建设，以整合校内或各学院内部的优势资源。

在厦大，跨界合作越来越多。2013年11月，厦大“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协同创新中心”被认定为福建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2014年7月，公共服务质量研究中心、海洋法与中国东南海疆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3个基地正式列入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建设行列。

不一样的平台带来不一样的收获。2013年9月，41岁的台湾研究院教授张羽作为首席专家主持的“海峡两岸历史文化教育中相互认知、表述、态度及影响研究”项目获当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张羽记得，当时的竞争对手在资历等方面胜出自己很多，但背后强大的学科和人才支撑让自己笑到了最后。

从理论思辨到实证研究

不少人这样认为，做文科科研，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足矣。但陈武元说，“繁荣计划”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即通过“加大对重点研究基地、实验室、研究中心、数据库和平台的支持”，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转变。“要从过去足不出户做科研转变为到田间地头做调查，从纯理论思辨转变为实证研究。”

明年初建成的公共政策实验室，将由公共政策仿真平台、社会科学计算平台、案例分析中心三部分组成。届时，厦大公共事务学院的师生们可以在这个全国高校并不多见的实验室里进行政策的模拟、仿真等实验，身临其境地感受相关研究的应用效果。

近年来，厦大经济学院一直积极推动研究方法和范式的转型，“繁荣计划”从硬件、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给予了更多保障。与现代经济学接轨的研究方法助推了研究成果质和量的飙升，以2013年为例，该院教师发表论文284篇，其中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44篇，在国外知名刊物上发表12篇。

从立足国内到对话国际

近两年，厦大各个学院的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国际化战略和走出去计划”。经济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面向全球发行的英文版《中国宏观经济展望》，是我国首份向世界发行的英文版中国宏观经济报告。人文学院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合作建设“中国民间文献与地方史数据库”，是国际首创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信息系统。国际关系学院专门制定了《关于资助教师和博士生赴东南亚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试行办法》，提供专项经费鼓励师生走出国门进行田野调查、课题合作。

厦大台湾研究院副院长邓利娟说，该院正在积极拓展与国外知名智库就台湾问题保持对话和沟通，“还要把我们的研究成果翻译成外文，向国际社

会宣传我们的观点”。目前，该院正在积极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前来开设“外国学者看两岸”系列课程，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内部共享课程。

来自厦大社科处的一份资料显示，2013年，厦大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被SSCI收录的论文共60篇，相当于学校“十一五”期间被SSCI收录的论文总数；以法学院陈安教授的《中国的呐喊：陈安论国际经济法》为代表的5部专著，在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出版。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11月19日

三、上海大学改革名额分配办法 博士招生不吃“大锅饭”

上海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往常每年有16个博士招生名额，2015年则有望增加到26个。记者日前从上海大学2013—2014学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发布会上获悉，该校将打破根据学科博导数量分配博士招生名额的做法，参照竞争性指标在各学科分配招生名额。

上海大学拿出招生总量的40%按学科规模分配，另60%则依据竞争性指标，参照各学科“产出”情况进行分配，主要指标包括承担国家项目情况、发表高水平论文数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等。

上海大学副校长吴明红表示，竞争性指标构成博士招生名额分配的主要依据，将打破各学科招生吃“大锅饭”的格局，博士新生更多流向发展势头好、科研产出多的学科。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11月4日

四、中外合作大学正向“体制内”高校传递压力

11月17日昆山杜克大学与首届新生正式搬入位于昆山的新校园，采用明末清初昆山学者顾炎武书法风格的“昆山杜克大学”竖匾首度亮相。三个多月前，上海纽约大学的师生陆续搬进位于浦东陆家嘴的新校园，教学和办公都在一栋15层高的大楼内，与纽约大学与曼哈顿金融区的“无缝融合”、“垂直大学”理念如出一辙。

也是今年，温州肯恩大学成功去“筹”字，首度面向外省市招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首次面向全国招生。

可以说，这是中外合作办大学在停滞了七八年之后重新开闸。此前，我国已拥有3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分别是：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中外联姻大学的新一轮集体亮相，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正迈入快

车道。对中国学生来说，这些高校的出现除了让“本土留学”成为可能，还意味着大学教育理念的转换——

对众多“体制内”的高校来说，联姻大学聚群，无异于是“狼来了”的信号……

解放学生思维，从打破文理分科和专业壁垒开始

文科生要学数学，理科生要学写作，上海纽约大学沿袭纽约大学严格的“通识教育”，尤其强调写作训练。相对于“千人一面”的本土高校，如此育才路径别出心裁。

2013年8月11日，我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合作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迎来首届新生：295名本科生，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上海纽大的母体院校，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与美国纽约大学。

在华东师大思群堂，伴随掌声和欢呼声，著名学者俞立中教授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我叫俞立中，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同学们可以按照英语习惯，叫我Lee！”就这样，一个曾主政中国传统高校十余年的校长完成了华丽转身。

在俞立中面前的是一所全新的大学。外人只要看看上海纽大的本科课程表，足以嗅到“洋高校”吹来的不同风向。在上海纽大，本科生课程包括“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专业课程”和“选修课程”三部分。本科前两年需完成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包括“社会和文化基础”、“写作”、“数学”、“自然科学”、“语言”五大部分；后两年，学生再完成大部分专业课程。

校方在设计课程时别出心裁。比如，在“自然科学”下设的“科学、社会和历史”课程，探讨的是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不同文化和历史时代的人对科学发现的态度，综合了科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另一门“科学基础”课程，要求学生同时学习物理、化学和生物，综合呈现不同学科的基本概念。

在这里，文理不再泾渭分明，学科与学科的界限也显得很模糊。校方声明，每个学生毕业时都要具备较高的数学水平，因为“作为一种‘通用语言’，数学被认为是解决当今世界很多重要问题的逻辑和分析工具，在愈发复杂的当代社会中获得生存与成功，每个人都需要它。”与之相对，理科生则要学习如何写作，并且，写作不止大一年级要上，还要通过“学科写作”融入学科教学，贯穿大学四年。

上海纽大沿袭了纽约大学或者说美式高校严格而坚实的通识教育，并对这种自罗马政治家西赛罗提出的教育理念毫不吝啬赞美之词。“无论学生的职业目标是什么，通识教育都成为了卓越教育的基石。抛开狭隘的就业考虑

，这种教育方式解放了学生的思维，促进自由发挥创造性。”

当越来越多的教育圈内外都充斥着本土高校“千人一面”、不同院校间鲜有办学特色可言的责难声时，以上海纽大为代表的中外联姻大学，则以风格迥异的育人方式成功地夺人眼球。改变，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龟速发展”，是为了尊重办学规律、精益求精

先开硕士，再开本科，龟速发展，小而精办学。美国私立名校追求“非常资源集中”的高质量精英化办学风格，给国内“体制内”院校带来强刺激。

紧跟上海纽大的脚步，第二所美国大学也来了。2013年9月12日，由武汉大学与美国杜克大学为母体大学的昆山杜克大学宣布正式建校。

正当外界期待杜克大学这所媲美常春藤盟校的美国南方名校会带来什么不同于上海纽大的课程体系时，它的“起步”令人始料未及：2014年秋季首次招生仅招3个硕士项目，预计5年后招本科，最后开博士项目，最终在校生不超过3,000人。

“对一个新专业，办了几届硕士后会形成教材体系和师资结构，有需求的话再办本科、博士项目，这样才是科学负责的态度。”在昆山杜克大学首任校长刘经南看来，如此“龟速发展”其实是尊重学术的严肃性，这延续了母体美国杜克大学谨慎办学的态度。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新排名，杜克大学全美排名第7，与麻省理工学院并列。杜克此次“远嫁”中国至少带来一个好处：让国内高等教育界得以坐在第一排围观它的办学思维。虽然前期仅开设3个硕士项目，分别是全球健康理学硕士、医学物理学硕士、管理学硕士，但足以发挥“管中窥豹”的效应。

以全球健康理学硕士项目为例，光听名字就能察觉它和国内很多硕士培养项目不同。比如，这个项目的学科融合色彩十分浓重。据介绍，它将致力于疾病预防，但会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等多方面探索导致疾病的原因以及如何促进健康公平性，将汇集医学、公共卫生、法律、经济、政策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同授课。

在师资方面，上海纽大和昆山杜克都花了大力气。目前，上海纽大的师资构成中，包括来自美国纽约大学的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等“学术大佬”。刘经南透露，昆山杜克大学设立后的前两年，就将邀请50多位杜克大学教授前往昆山授课，与此同时，该校全球招聘的师资将委托杜克大学相关学术委员会招聘，接受聘任的教师都将在杜克大学学习一段时间，以保证其达到“杜克水准”。

华丽的教师阵容注定了课程开设成本极高，并且，不论是上海纽大，还是昆山杜克，都坚持“小班教学”——

上海纽大公布的师生比是1:8，这是国内无论哪个大学都无法做到的。而昆山杜克首届全球招生100人，换言之，平均一个硕士项目仅招30人。

据此，这批中外合作大学收取相对高昂的学费就变得容易理解（约10万元人民币/年）。一位国内“985工程”大学校长告诉记者，中美合作大学给国内体制内院校带来的强烈刺激之一就是：如同美国私立名校般追求“非常资源集中”的高质量、精英化办学。

教学质控拒绝“严进宽出”

每份作业要经过防抄袭检索鉴定系统，每份试卷要经中英内外部考官评估。当国内传统高校备受“严进宽出”的质疑，西交利物浦大学引入外方严苛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如果把中外合作大学比作一个竞技场，无疑，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已经完成了在中国大陆的“首秀”。它们未来会走得如何？已经办学8年、拥有5届毕业生的西交利物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为合作母体院校）或可提供一个可参照的答案。

主政西交利物浦大学8年，执行校长席酉民深悉中外合作大学的光环效应及其所要突破的障碍。

比如招生。如同上海纽大美方校长雷蒙在开学仪式上赞誉首届新生拥有“无上的勇气”一样，席酉民直言，最初选择西浦的家长和学生是在“赌博”。多年来，席酉民从不讳言他们的招生状况：“我们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只比各地一本线高10来分，与北大清华相比，我们录取的是比较普通的学生。”

不过，这批“中等生”在西浦却攒得一副好牌：超过80%的学生赴牛津、剑桥等世界名校读研究生，还有不少同学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或创业。

逆袭式的桥段让人不禁发问：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1年，一条微博爆料无意中令外界窥见此地的学习氛围。那年冬天，建筑系专用自习室里，大二学生吴敬之正专心画图纸，而他身后搭起了一顶帐篷。

“帐篷哥”一举成名，记者跑去找建筑系外教托马斯谈看法，没想到托马斯见怪不怪，并称“这在国外很常见，有人会把毛巾、牙膏、毯子、折叠床搬到自习室，我还见过有人把冰箱抬来的。”

在国内传统高校饱受“严进宽出”的质疑时，西交利物浦大学里高涨的学习热情首先来自分等级学位的压力。根据英国学位授予制度，学位证书将

根据学业成绩标注等级，分别为一级荣誉学位、二级甲等荣誉学位、二级乙等荣誉学位、三级荣誉学位和通过学位这五个等级。

“拿到学位等级越高，未来读研或就业的机会就越好，所以大家都很拼命。”采访西交利物浦大学时，让记者印象最深的，正是这里严苛的英国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认证。

西交利物浦大学是目前国内唯一同时授予中英学士学位的中外合作大学，这意味着它要接受中英两国政府双重教学评估。为达到英国学位授予要求，该校的所有教学过程按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AA）的标准执行。从大一开始，每份学生作业要经过防抄袭检索鉴定系统。每份试卷除经内部考官评估，还要送给利物浦大学聘请的外部考官评估。

这套教学质控体系还规定了严格的升级制度。每学年考试不及格率在10%左右；每门功课只有一次补考机会，补考不及格就要留级。事实上，该校首届学生有164名，顺利毕业的仅136名。未毕业的学生有因身体原因、转专业等主动申请留级的，也有相当部分是因为补考不通过或考场作弊受到留级处理。

曾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离开“体制内”高校，席酉民感到的最大不同是，现在是以制度形式保证高校的教学质量，这样才能真正地有据可查、不失水准。

教授治校，让校园回归单纯治学

回归到以学生和学术为本位，让行政为学术服务，让教师都能安心教书、做研究……中外合作大学的实践直触体制内高校备受质疑的沉疴。

无论是新近出现的上海纽大、昆山杜克，还是此前成立的宁波诺丁汉、西交利物浦等，他们在给中国学生提供更多教育选择的同时，也被赋予“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探路者”的使命。

在昆山杜克大学正式建校的新闻发布会上，校长刘经南就宣布，学校将坚持按照现代大学制度制定学校章程，构建内部治理结构，突出教授治校原则。短短数语道出这所中外联姻大学将践行的全新办学理念。

在西交利物浦，行政人员会告诉你，始于校长，行政与教学就泾渭分明。根据学校制度，涉及学术发展事务等均由教师组成专门的学术组织或委员会处理，行政权力不得干涉，而是要利用权力和资源为学术活动提供高效的支撑。“在大多数的评审表格上，没有行政人员签字的地方。”一位副教授如是说。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张红霞曾指出，与普通高校相比，西交利物浦最大的特点就是“去行政化”。“我们很多大学衙门化色彩太浓，校领导、

中层领导都有行政级别。级别越高，能获取的资源越多，致使很多教师难以安心做研究，都想当行政领导。”

实际上，“教授治校”、“去行政化”在中外合作大学是最高频出现的两个词。在教育研究者看来，“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而是要回归到以学生和学术为本位，让行政为学术服务，让教师都能安心教书、做研究。

中外合作大学的使命还不止于此。

“上海纽约大学并不是纽约大学的上海分校。”“昆山杜克大学不是武汉大学、杜克大学这两座母校的简单叠加”……无论是俞立中，还是刘经南，都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外合作大学不是“复制粘贴”，而是优势互补，是对全新大学的探索与示范。

“当你在学习别人的时候，别人其实已经有瑕疵了，中外合作办学要有创造新模式的勇气。”在席酉民看来，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知识获取变得便利，网络革命彻底颠覆了传统大学的教学方式，探索一所新大学迫在眉睫。

目前，世界上有三大高等教育体系，北美的大学体系有足够的灵活性，学生有自我设计的空间，例如，拥有众多的选修课和自由转换专业的权利；英式的高等教育有着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每个教学环节的质量；中国教育重基础，学生的基本功扎实。从中外合作大学办学者透露的办学规划可知，对这三种模式皆采取开明态度。

各种关键问题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种种改革能否“移植”给国内本土高校？有“体制内”高校领导者直言不讳，“中外合作大学有体制优势，没历史包袱，所以中外合作大学干得成的事，传统大学只能看，没法干。”

对此，席酉民并不赞同。“这个问题涉及三方面：体制、管理、教学。在现有体制下，依然有很多管理架构、管理效率、教学模式等可以改变，关键是想不想改。不要把体制当成不作为的借口，这样会失去很多改革的动力和机会。”

来源：《文汇报》2014年11月18日

五、米格尔·帕迪拉：美国公立大学教师工作满意度提升策略

第一，提高待遇。关于大学怎样做才能够提升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毫不奇怪，调查中教师提出的举措之一是提高工资，这是一种经济策略，以物质的因素来提高大学教师工作的满意度。因为在提高工作满意度方面，受访者在反馈中用的字和短语有“提高待遇”“增加工资”“更多的钱”“改善待遇”“加薪”“提高薪水”和“极力解决薪金压缩问题”，这些表明了他们

的态度。39%的受访教师强调了更好的待遇对教师工作满意度的重要性。一位副教授强调说：“学校要保持薪水在同类的高校和同类的专业领域中有竞争力，不能说学校在解决这个难题上束手无策。”在待遇这方面，老师们提出绩效工资的重要性。他们指出“高绩效高工资会有帮助”，“重新考虑老师们的工作量和薪金档次”，“对绩效高的老师要保证能增加他们的工资”，也有人提出要“减少报酬不平等”。他们建议学校要争取更多的资金，并保证把钱用于教学和科研上。在经济大背景没有改善的条件下，这样的策略意义不大，但非经济策略却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减少压力。减少压力的途径之一是减少教学量并使之合理化。一位杰出教授建议：“非终身制的教师应该可以只承担每学期两门课程的教学任务，然后才能够提升他们的学术研究标准。”另一位杰出教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不发表文章的终身教授应该每学期担任三门研究生课程或四门本科生课程，发表文章的终身教授应该每学期只担任两门课程，从而保证所有老师都分担适当的工作量。另一个减少压力的方式是改善师生比率，同时招收高质量的学生。这一方式需要增加教师的数量，减少班级学生人数，而且要保证更好的学生质量。

多位教授指出：要降低教师写科研资金申请和获取资金的压力；对于那些外部科研资金很少的学科，更有必要减少他们申请外部科研资金的压力。多名老师建议学校应该鼓励所有形式的发表物和学术活动，鼓励更多的创造力；还有很多教师要求对自己提供的服务算工作量或者至少年终评定时要把一些服务算为工作成绩。

助理教授强调学校对评定终身教授和晋升职称应该有具体清楚的期望而且保持连续性和一致性，让争取终身制的助理教授有明确的目标；他们还希望学校降低对做会议报告的要求，要求学校给予参加会议的足够资金；因为要求教师参加会议做报告但不给予足够的资金是不合理不可行的模式。

第三，提高支持度。组织的支持程度显示于个体的全部信念中，包括组织对他们所贡献价值的认可和对他们的福利的关心。因为组织支持与组织承诺正相关，与员工旷工负相关和离职倾向负相关，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正相关。受访者提及要改善学校的物质和社会工作环境，争取给每位教师提供更多的高科技设备。同时，他们提到了社会支持度的必要性，建议“提供一个教师俱乐部，在这里全校教师们可以彼此会见而且相互学习”；同时，学校要听取老师们的心声，要对老师表现出应有的尊重，这样对他们工作满意度的提高会很有帮助。

一些教师提议学校要提供更好的秘书支持，建议学校提高行政秘书的工

资，这样才可以雇佣水平高、有责任心的人做行政秘书。一位教授说：“我非常在乎做好工作，但是感觉学校没有可靠的支持，从而，我不得不对每一件事的所有细节都操心否则事情就完不成。例如，我组织国际交流项目或在国际会上作讲座等需要学校给予很多支持，但学校给我的支持是零。尽管我做这些事情系主任是鼓励的，但是，即使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没有人帮我去做，从而，我只好从与我合作的组织那里寻求支持，因为我不能从所在的系里得到支持。”一位杰出教授提议：大学需要建立一个为5—7名教师配备1名秘书的规定。

在调查反馈中，受访者24次提及要提高行政管理或者改善领导，4名教授强调了“雇佣更好的行政人员和系主任，强调要在全中国范围内公开招聘雇佣更好的人员，而不是经常在本校内部聘用”；“需要把院系管理得更好，要模仿更先进的大学的做法”。另外，老师们提出了要奖励贡献突出的老师，而解雇那些对工作没有丝毫热情而且把别的老师搞得很痛苦的人；要给予更多的公共奖项来表明老师们的工作价值得到珍视；要改善现有资源投入，包括配备研究生助教和其他技术服务。他们提出：当有教师对学校的管理提出问题时要给他们提供反馈；如果没有什么可以做来改变现状就如实说，但学校不能不理不睬。其他值得一提的建议是：从根本上提高录取学生的标准，并允许专业学校（比如医学院）有他们自己的录取学生标准。如果有了高质量的学生教师们的满意度就会更高。（作者系美国欧道明大学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来源：《高校教育管理》2014年3期

六、牛津大学：成立首个金融大数据实验室

英国牛津大学日前成立首个金融大数据实验室，旨在研究分析金融市场各方相关行为和数据，探索市场规律，将大数据技术更好应用于金融领域。这所实验室名为“牛津-聂金融大数据实验室”，由香港金融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聂凡淇捐赠。

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在实验室揭幕仪式上说，大数据的价值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正被各个行业加以利用。金融危机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金融业的弊端，而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更可靠的金融决策，成为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相信这一实验室能在该领域取得更多成果。成立这一实验室，就是为了能在大数据时代更好地研究分析金融市场中的行为和数据，更准确地发现和利用市场规律，希望实验室能将业界和学界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共同推动金融领域的发展。

除了这所实验室，香港金融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还将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等英国顶尖学府率先推出“金融创新工场孵化计划”。这一计划包括推出一款模拟证券交易的应用程序，依托移动互联网并结合量化交易和大数据技术，让高校学子能在这一平台上学习锻炼，培养投资兴趣并提高金融“实战能力”。

来源：新华网2014年11月3日